

天地之间

——林同济文集



复旦学人文库

文化形态史观

士大夫文化批判

“力”的学说

中国思想的精髓

Sullied之辨——《哈姆雷特》一词管窥

许纪霖 李琼 编

Xu Jilin

Li Qiong



復旦大學出版社

PDG

○责任编辑 林 森 ○责任美编 孙 瑾



ISBN 7-309-03911-4




9 787309 039115 >

1 · 249 定价: 35.00元

天地之间

——林同济文集

许纪霖 李 琼 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许纪霖,李琼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
(复旦学人文库)
ISBN 7-309-03911-4

I. 天… II. ①许…②李… III. 林同济—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1301 号

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

许纪霖 李 琼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林 森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7.25 插页 4
字 数 341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 100

书 号 ISBN 7-309-03911-4/1·249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林同济是“战国策”派中的一员，其实，这位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博士，是现代中国难得的才子型学者：他是政治学家，也是哲学家，又是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专家，其“雄辩式英语”连钱钟书先生也颇为赞许。作为一位柏林所说的“狐狸型”学者，其深邃的思想印证了中国知识人心灵的丰富和复杂。本集收录林同济一生所著之主要文章和其他学人对他的评价和缅怀文章，希望从林氏的心路历程中，丈量出现代中国思想的某种深度和广度。



1947年林同济访英时摄于伦敦海德公园。

定中

潘大達教授（美威士康辛政治學碩士）亦難得
之才方政位思其與制度之才亦好曾著若干相
關之書籍亦不四能政亦有云不電讀有府許
鵬飛先生妙中誠恐各方競爭罷致人才之
結果前所稱各人物均莫能未用敢再言其情
况生惟 之与烟燻之竟答之与 中至昆明佳地
多至龍堆三考王龔恩先生妙為也

林同济

100
7.36
137

做去是果費輩先生不來則
若先生當主任案內人選實也

七月廿二

南島校長各乞賜示言前正及坡炳堪信誦是
亦乘三青園遊約信誦之便口九日左右飛昆
明月一月內各返海園於徐敦璋先生信聘
予為也 貴校最近能有負責人到南島年
海棠溪向家坡買地要且會校新定與之面
商一切蓋此向某古地心在求聘予為校長與教
授不急行恐有差也 光緒廿年五月五日
授方親促駕方有勁 甲午二月廿五日未得拜辭
多致 務往先生之亦可也於早晨打電話(南島)
三〇七八 技術室 須以爲忘 再者江西甲正不誤



1959年摄于北京，左起为：林同济，林母和林同奇。

林同济的三种境界

(代序)

许纪霖

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民族主义是最强大而持续的思潮之一。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几乎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信念。然而,民族主义是否可以代替儒家的传统信仰,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拟从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个案——林同济的思想出发,来进行考察。

林同济作为战国策派的核心成员,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因为其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曾经一度被视作是为国民党统治张目,甚至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林同济的研究有了很重要的深入,对战国策派的历史评价也趋于客观公正,江沛等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标志着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①。不过,林同济本人的思想,又非一个战国策派的群体研究可以囊括的。他是一个政治学出身的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但与一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林同济不满足

^① 参见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第11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丁晓祥、温儒敏:《“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构想》,载《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于当一个专业学者,他的关怀和眼光极其宽广,对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涉猎广泛,其思想格局之大,绝非一个“战国策派”的知性定位可以囊括。

林同济的内心世界和知识疆域是丰富的,但其内在结构又充满了紧张。以赛亚·柏林说:有两种思想家,一种是刺猬,另一种是狐狸^①。林同济本意想做一个创造体系的刺猬,但按其不安分的气质来说,还是一个充满了知识好奇、思维发散而又不无冲突的狐狸。如何在他散漫的论述中,寻找其思想的内在结构,是本文最重要的目标。根据已有的和新发现的史料加以分析,我发现,在他的思想中,具有三种不同的境界:国的境界、力的境界和宇宙的境界。这三种境界,在他一生的心路历程中,逐次递升,层层推进,其中,为人们所广泛注意的“国家民族至上”的国的境界是最浅层的;以力本论为基础的力的境界是其思想的核心,却依然不是他的终极理想;林同济所期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审美的、和谐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即使在这三种境界内部,也充溢着饱满的张力:个人与国家、尼采与庄子、儒家与道家、世俗与宗教之间具有无法完全消解的紧张和冲突。而在紧张和冲突的人生中,试图寻求终极之物的意义,又是林同济个人思想的矛盾和复杂性所在。

一、国的境界:“国家至上是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

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即现代的国家主权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本来并不是自明的。过去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没有

^① 按照柏林的描述,刺猬有一知,善于创造思想体系,狐狸有多知,没有成体系的思想,但具有思维的发散性。参见柏林:《刺猬与狐狸》,载《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国家的意识,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①。如果说传统中国有民族主义的话,那仅仅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以是否认同中华文化作为区别我族与他族的根本标准。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列强用炮火逼迫中国卷入全球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萌生了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从晚清梁启超“群”的观念到“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民族国家观念是一回事,将民族国家作为最高的价值,成为“至上”的境界,又是另一回事。将民族国家观念视作至上的价值,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除了曾琦、李潢、左舜生的国家主义派和张君勱、张东荪的国家社会主义派之外,就要算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了。

作为战国策派的核心成员,林同济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应该发生在青年时代。他16岁考入清华。在当年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们接受的虽然是全盘的洋化教育,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反而比一般学校的学生更加敏锐。林同济虽然入学较晚,在“五四”爱国运动的三年之后方跨入校门,但上海的“五卅惨案”、近在眼前的“三·一八惨案”,都给他留下很大的心灵震撼,使他有一种强烈的“国将不国”的忧患感。乃至他出国留学,国家被瓜分的忧虑依然像死结一般缠绕在他心头。在伯克利攻读学位的时候,他花了很多工夫收集日本在东北修建铁路的资料,通过仔细的研究,发现日本对东三省有鲸吞的计划。1930年,他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一书,用大量的资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及一年,林同济的预见不幸言中^②。林同济在美国深受刺激,强烈感觉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国力不如人,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② 参见林同济:《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和人生观都有问题,而最紧迫的问题,是在一个国与国之间力的竞争大格局中,缺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有组织的力量^①。

林同济回国后不到三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与雷海宗等人先是办《今日评论》,随后出版《战国策》杂志,开始全面宣传“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念。为什么民族国家拥有至上的地位和价值?林同济有一套他称之为“文化形态历史观”作为其论证。他深受欧洲的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影响,相信在历史的演化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用文化综合或文化统相(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方法,发现文化形态演化的规律。他相信,凡是成体系的文化,都会经过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和大一统帝国阶段。中国如此,希腊、罗马如此,世界上几个重要文明无不如此。在封建阶段,社会的分层是上下结构的世袭等级制,国与国之间的统治阶级彼此可以通婚,互相打通。但到了列国阶段,“上下之别”就变成了“内外之分”。种族的差异超过了阶级的差别,由此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自觉。两个大潮流在列国阶段激荡不已:一是个人意识的伸张,二是政治组织的加强。而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两个矛盾的观念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之融合于一体。那么,20世纪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林同济明确地说:是列国(战国)阶段。眼下的世界大战,正是列国为了生存而产生的激烈竞争。在此列国纷争格局下,中国唯有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作为自己唯一的选择,这不仅是抗战时期的特殊口号,也是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②。

^① 参见林同济:《思想检讨报告》(1952年7月20日),原件藏复旦大学档案馆。

^② 参见林同济:《形态历史观》,《大公报》(重庆)1941年12月3日;《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大公报》(重庆),1942年6月17、24日;《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1月1日。

林同济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种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然而,现代的民族主义仅仅是打破阶级的沟壑,产生于种族的集体认同吗?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与政治共同体建构的内容?关于这些问题,林同济为了照顾其整体的形态历史观,都是无暇顾及的。即使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形态历史观的许多理论预设和经验论证也需要反复斟酌。然而,这些瑕疵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林同济并不是真的要在学术层面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是为民族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建立合法性论证。他不是作为专业的学者,而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从事这项工作的。

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专业学理来建构的时候,林同济碰到的问题在于: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一般的知识论证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但对于广大蒙昧的民众来说,你如何让他们接受国家民族本位?中国老百姓是有信仰传统的:信神灵、信菩萨、信祖宗,而且在民间还有一整套完整的宗教礼仪。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是否可以代替它们,作为现代公民的膜拜对象?林同济对此是很犹豫的,作为科班出身的政治学博士,他明白,无论是民族还是国家,都是世俗创制的产物,它缺乏超越性,无法与神圣之物相关,因而难以成为信仰的对象。当民族国家与信仰无关的时候,它就无法成为平民百姓的普世性意识形态。事实上,林同济关心的,与其说是民族国家的绝对价值,倒不如说是如何在激烈竞争的战国时代,使得中国的民众有一个公共的集体认同,并以此建立团结有效的政治共同体。当民族国家作为有限之物,无法满足百姓的终极信仰时,林同济所能想到的替代物,则是宗教:一种有限对无限、自我对无穷充满虔诚敬畏的自然宗教。这样的自然化宗教没有具体的人格神,只是对“一”作为无穷的终极之物的膜拜。林同济希望通过一整套传统的祭天礼仪,将现代的公民与国家的世俗关系,纳入到个人与天(天的核心内容为“一”)、自我与无穷的神圣网络之中,从而让民族国家这一凡俗的共同体拥有

神圣的超越意义,以解决民族的公共认同^①。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通常是在特定种族或文化的历史性中获得合法性的论证,但林同济显然意识到在时间的维度中建构起来的民族共同体是单薄的、有限的,他力图在“一”这个神秘的无限之物中,通过空间维度的再造,为民族主义提供厚实的认同基础。然而,就是在这里,内含着一个民族主义的自我否定的可能性:既然“自我”有可能通过个人的信仰与“无穷”沟通,在逻辑上就不必再需要民族国家这样的中介物,从而民族主义的集体目标被个人主义的自我价值所颠覆。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正是沿着这一逻辑,林同济后来慢慢地从群体的民族主义走向了个人的审美之境。

事实上,即使在文化形态历史观中,群体与个体、国家与个人之间也具有某种紧张性。在林同济的论述中,列国时代有两个冲突的大潮流:“个性的焕发”和“国命的整合”。前者是“根据着个人才性的尊严与活力而主张自由平等,是一种离心运动,针对着封建阶段的层级束缚而奋起的”。而后者“注重统一与集权,是一种向心应对,目的要在层级结构打翻后,再把那些日形‘原子化’、‘散沙化’的个人收拾起来而重建一个新集体”^②。在欧洲历史上,这两个潮流是先后发生的,有时间上的序列,但在现代中国,当“个性的焕发”尚未完成之际,由于民族危亡的压迫,已经有了“国命的整合”的迫切要求。“我们却要同一时间内,两者并行,一面赶造强有力的个人,一面赶造有力的社会与国家。”^③这就构成了某种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在“国”与“人”之间,什么才是林同济关怀的重心?

① 林同济:《民族宗教生活的革创:议礼声中的一建议》,载《时代之波》,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第97页。

② 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③ 林同济:《阿物,超我与文化》,载《时代之波》,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第287页。

我发现：虽然林同济一再强调民族国家的至上，但他思考的真正着眼点毋宁说是人。林同济在《战国策》中所有的论述，归结到最后，可以说是基于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意识：在这样一个以力为中心的战国时代，为了民族国家的重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格？这一思想脉络显然是晚清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五四”时期《新青年》的“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延续。张灏先生曾经深刻地分析过“五四”思想中的复杂的两歧性：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①。这就意味着，“五四”思想中，不仅有法国式的理性启蒙主义，同时也有德国式的狂飙运动传统。林同济以及雷海宗、陈铨这批战国策派所继承和发扬的，正是注重个人的感性生命和意志力量、力图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狂飙运动精神。而狂飙运动所关怀的问题核心，表面看起来是民族主义，实则却是人，作为民族精神的国民人格。林同济从民族和国家出发，苦苦思考的终极目标却是国民：中国的传统国民性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不再能适应“力的竞争”的战国时代？在民族主义的大目标之下，又如何重建新的国民人格？

二、力的境界：“力乃一切生命的表征， 一切生物的本体”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人心的秩序与宇宙的秩序具有同一性，人格的塑造首先取决于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在战国策派成员之中，雷海宗富于历史意识，陈铨很有文艺理论修养，相比之下，林同济是最具有形而上气质

^①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的。为了论证民族主义的合理性，特别是建构战国时代新人格的需要，林同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从宇宙观、社会观到人生观的整合性世界观。

1940年，他在著名的《力！》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力的世界观：

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间没有“无力”之生，无力便是死。——生、力、动三字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宇宙神秘连环^①。

在林同济看来，这个宇宙的本质就是力，他引用哥白尼的话说：“无穷的空间，充满了无数的力的单位，在力的相对关系下，不断地动，不断地变”。欧洲的文化精神实则就是哥白尼的这种力的宇宙观^②。林同济不仅把力作为宇宙的本源，而且将其看作泛生命存在的根本，赋予了其本体性的意义，从而提出了一种力本论的思想。

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力的位置一直是缺席的。在原始社会，人为了获取食物，与大自然奋斗，力作为一种感性的生命力量，尚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当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西周思想和先秦儒家思想中很早期地出现了德的概念，德成为从宇宙秩序到社会秩序乃至心灵秩序的核心，世界之所以是有意义的，乃是因为它是有德的，宇宙的德性与人间的德性相通，构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思想的内核。

以德为中心的世界是一个礼的世界，它是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意识一致的。只要天下不亡，这个世界就依然以华夏的礼为核心，按照普遍的、同一的德性原则来安排宇宙、社会和人心秩序。

^① 林同济：《力！》，《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② 林同济：《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大公报》，1942年2月14日。